

12-23

出土《詩》學簡帛材料研究綜述*

The Summary on Study of Unearthed Material of Bamboo and Silk of the Book of Songs

曹建國 (Cao Jianguo)、張玖青 (Zhang Jiuqing) **

綜述出土《詩》學簡帛材料的研究狀況，本文採用先分說再綜合的方法，即先對重要的《詩》學簡帛材料的研究狀況分別加以描述，再略述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阜陽漢簡《詩經》

關於阜陽漢簡《詩經》(以下簡稱《阜詩》)，學術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異文研究，胡平生〈阜陽漢簡《詩經》異文初探〉、黃宏信〈阜陽漢簡《詩經》異文研究〉、許廷桂〈阜陽漢簡《詩經》校釋割記〉等。¹基本上，大家都是從文字、音韻、訓詁的角度討論《阜詩》的異文，並將之與漢四家詩學相參比。二是對阜陽《詩經》承傳的判斷。《阜詩》的整理者胡平生、韓自強認為《阜詩》有別於漢代魯、齊、韓、毛等四家詩學，屬另外一家不見傳世文獻記載《詩》學承傳系統。²李學勤認為《阜詩》是在楚地流傳的《詩》本。³孫斌來贊同李學勤的說法，並進一步論證《阜詩》的成書年代在楚靈王時期，抄寫年代則在劉邦稱帝之後，劉盈為帝之前。⁴三是通過《阜詩》探討《詩經》早期的文本形態，試圖解決「孔子刪詩」之類的問題，

如許志剛的〈漢簡與《詩經》成本〉。⁵

包括《阜詩》在內的戰國秦漢簡，文字音聲通假的情況非常普遍，甚至到了非常隨意的程度。所以，我們利用簡帛異文可以進行文字、音韻方面的研究，看作是漢語史料，也可以用來與傳世本進行比對校勘，作些古籍整理方面的研究。但如果依據異文去進行學派傳承方面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有可能十分危險。《阜詩》異文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因為《阜詩》簡與今傳本《詩經》有較大的文字差異，就斷定《阜詩》是獨立於漢四家詩之外的另一家。那麼《阜詩》到底屬於哪一家，或者說《阜詩》是否可以稱得上是一家，目前的材料還不能得出比較確切的結論。

但是利用《阜詩》來討論《詩經》成書狀況則是完全可能的。這裏有一些資訊值得我們重視：一是大小170餘片竹簡上，沒有發現編線，也沒有發現為編線而刻的三角缺口，在殘簡的字裏行間也沒有找到通常由於聯綴編繩而出現的較大空格。二是《阜詩》簡字體大小不一，筆跡也不似出於同一抄寫者。三是《阜詩》簡中出現的「右方北國」(S051)、「右方鄭國」(S098)之類的簡文，這些內容無疑標誌了《阜詩》某種秩序。四是

* 本文受到大陸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專案「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03JZD0010)資助。

** 曹建國，復旦大學文學博士，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張玖青，浙江大學古籍所文學博士，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文化傳播學院講師。

1 胡平生，〈阜陽漢簡《詩經》異文初探〉，《中華文史論叢》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36；黃宏信，〈阜陽漢簡《詩經》異文研究〉，《江漢考古》1989: 1: 85-91、99；許廷桂，〈阜陽漢簡《詩經》校釋割記〉，《文學遺產》1987: 11: 129-133。

2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31。

3 引自《阜陽漢簡《詩經》研究》，頁31。

4 孫斌來，〈阜陽漢簡《詩經》的傳本及抄寫年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 7: 14-17。

5 許志剛，〈漢簡與《詩經》成本〉，《文獻》2000: 1: 4-17。

《阜詩》簡中寫有「后妃獻」、「風君」等字的殘簡，整理者以為是《阜詩》的〈詩序〉殘文。⁶這對我們研究解決〈詩序〉的作者這一「《詩》學公案」是很有價值的。但需要說明的是，胡氏發表於《文物》上的論文，有「后妃獻」等殘簡的簡文，在文中也專門討論了〈詩序〉的問題。但在《阜陽詩經研究》一書中，出示的簡文卻沒有這些殘簡，文章中也刪去了討論〈詩序〉的那部分內容。五是簡文的疊壓以及竹簡背後的印痕。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帝時，……《詩》始萌芽。……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于全經，固已遠矣。」⁷對照《阜詩》，則劉歆之言不能說沒有根據。如此說來，阜陽《詩經》雖為漢簡，卻是最接近先秦《詩》的原貌，甚至可以看作是先秦《詩》本的殘遺。⁸所以《阜詩》對我們研究《詩經》的成書，及「孔子刪詩」等問題都有重大意義。

二、郭店楚簡

郭店楚墓竹書〈五行〉、〈性自命出〉、〈緇衣〉等篇都曾涉及到《詩》，連同此前出土的楚帛書〈五行〉的經、說，以及此後發現的上博楚竹書中的〈緇衣〉、〈性情論〉

（〈性自命出〉）等可以放在一起討論。〈緇衣〉等《禮記》諸篇，此前由於受到疑古派的影響，人們目之為漢人作品而並不重視它。此次隨著竹簡〈緇衣〉的發現，人們自然要將之納入先秦學術傳統中去。〈緇衣〉大量引《詩》，但人們從來都是將其視為是「斷章取義」的產物而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郭店以及上博竹書〈緇衣〉出土，也有一些學者對其引《詩》與傳世本〈緇衣〉的引《詩》作了較比，但仍然限於文字學及音韻學方面的討論，作異文研究，如廖名春、王平等。⁹值得注意者，有學者利用〈緇衣〉等引《詩》來探討《詩》的原初意義，如廖名春〈郭店楚簡與《詩經》〉、藪敏裕〈《詩》的最初意義與郭店楚簡〈緇衣〉篇〉。¹⁰儘管其結論不無可商，但其思想的言路卻具有很大的啟發性。

關於〈五行〉篇與《詩》的關係，此前似乎並沒有引起學者的注意。但隨著《孔子詩論》的公布，尤其是當《孔子詩論》論〈關雎〉與帛書〈五行說〉存在某種聯繫，於是在大量討論《孔子詩論》的論著中便會提及〈五行〉作為一重要的參照。比如魏啟鵬〈簡帛〈五行〉直承孔子詩學〉¹¹便是利用《孔子詩論》的某些材料，得出簡帛〈五行〉承傳孔子詩學的結論。

〈性自命出〉雖是一篇討論人性論的文章，卻與《詩》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它不僅為先秦《詩》學闡釋提供了某種理論支撐和方法論，並且非常切近孔子「思無邪」的理論主張。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文結合《孔子詩論》來討論，暫不贅。〈性自命出〉的《詩》學意義文章有饒宗頤的〈從郭店楚簡談古代樂教〉，古時《詩》、樂不分，如果說樂是古人道德之進階，自然也有《詩》的參與。李天虹〈從〈性自命出〉談孔子與詩、書、禮、樂〉認為〈性自命出〉第15-18號簡的四個排比句，分別講述了聖人對詩、書、禮、樂所進行的整理、編纂

6 同註2，頁23-35。

7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36，頁1968-1969。

8 這也是我們將其納入本課題研究範圍的主要原因和內在依據。

9 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篇引《詩》考〉，饒宗頤主編，《華學》第4期（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頁62-75；王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緇衣〉引《詩》異文考〉，《華東師範大學學報》35:4（2003.7）：72-78。

10 廖名春，〈郭店楚簡與《詩經》〉，吳思敬、趙敏俐主編，《文學前沿》第2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35-52；藪敏裕著，陳中浙譯，〈《詩》的最初意義與郭店楚簡〈緇衣〉篇〉，《清華大學學報》17:2（2002.3）：79-84。

11 魏啟鵬，〈簡帛〈五行〉直承孔子詩學〉，《中華文化論壇》2002:3:124-126。

工作，與傳世文獻所載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之事一致。其欲以證成孔子刪詩之事，只是證據稍嫌薄弱。

三、上博簡《孔子詩論》

上博簡《孔子詩論》可以說是近年來簡帛研究的最大熱點之一，也許它帶給學術界有關先秦學術思想的深層思考不如郭店楚墓竹書那樣深刻，但它絕對是學術界最感興趣的一個話題。因為其與傳世文獻《詩經》可以相參比，所以很多人都感到對《孔子詩論》有話要說。據筆者的統計，截至 2005 年 6 月，報紙上發表的《孔子詩論》研究論文 22 篇，期刊論文 211 篇，會議論文 97 篇，網站論文 119 篇，碩、博士論文 17 部，專著 7 部，涉及包括文學在內的諸多領域。統計肯定有遺漏，且較少涉及臺、港及海外，但這種熱鬧非凡的場面在出土文獻研究中已是非常少見了。但這麼多的研究成果涉及《孔子詩論》的哪些方面？解決了什麼問題？這確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對於任何的一種出土文獻研究無非包括兩種類型：整理性研究和價值性判斷。對《孔子詩論》的整理性研究包括：文字校釋、篇名考訂、簡序編聯、留白簡形制認定、篇名與作者。而價值判斷或者說學術史的研究則涵蓋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宏觀是討論《孔子詩論》在整個學術承傳中的價值和地位，而微觀則涉及《詩經》學史、詩旨闡釋、《孔子詩論》的思想淵源、《孔子詩論》詩學批評意義等方面。以下試分別加以陳述。

從整理意義上說，上博《孔子詩論》簡的整理性研究可分為兩個階段：整理階段和後整理階段。所謂的整

理階段是指上博《孔子詩論》簡連同其他竹簡入藏上海博物館到 2001 年 12 月公布發表這一階段。初期的整理工作由李零完成，他做了初步的竹簡歸類和文字釋定。然後由馬承源對《孔子詩論》進行整理，馬氏將其分成「詩序」、「訟」、「大夏」、「少夏」、「邦風」、「綜論」五部分進行編聯。據濮茅左介紹，馬承源在整理《孔子詩論》時曾考慮了十幾種方案，發表時採用的只是其中之一。其排序的主要依據有三種：「孔子曰」的傳統主幹線索，竹簡特殊形式的導引標誌，不可拆分的篇名組合。為此，濮茅左還特意提供了竹簡編線的殘留情況、契口位置、竹青面的文字、篇名、特殊符號、每簡長度與字數等具體資料。¹²但竹簡公布以後，立刻引起很大的反響，許多人對《孔子詩論》的整理提出異議，並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文字考釋

關於文字考釋，筆者統計了 130 多篇。學者或以校箋、校注的方式對《孔子詩論》文字作了重新隸定和釋讀，如李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文校訂〉、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王志平〈《詩論》校箋〉、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釋〉、范毓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釋文、簡序與分章〉、俞志慧〈《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校箋〉。¹³更多的學者是以選釋、補正的形式對其中分歧較大的地方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如何琳儀〈滬簡《詩論》選釋〉和黃德寬、徐在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釋文補正〉。¹⁴還有學者專門對某些字進行討論，如李開〈滬博楚竹簡《孔子詩論》「𠂔」考釋〉、李學勤〈釋

12 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解析〉，見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9-50。

13 李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文校訂〉，《中國哲學》第24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頁182-188；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中國哲學史》2002: 5: 9-19；王志平，〈《詩論》校箋〉，《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210-227；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釋〉，《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52-172；范毓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釋文、簡序與分章〉，《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73-186；俞志慧，〈《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校箋〉，簡帛研究網站 2002.1.7。

14 何琳儀，〈滬簡《詩論》選釋〉，《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243-259；黃德寬、徐在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釋文補正〉，《安徽大學學報》26: 2（2000.3）: 1-6。

《詩論》中的「兔」及從「兔」之字」。¹⁵

後整理階段的釋文工作，幾乎對每一處有爭議的地方都進行了反覆的討論。一些關鍵性的字，在初期存有很大的分歧。如第1簡「詩亡𠂔志」的「𠂔」，整理者釋作「離」。在後整理階段，就有「隱」、「泯」、「吝」、「陵」、「忒」等多種釋法。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之後，大家的意見也漸漸統一，如「詩亡𠂔志」的「𠂔」，現在基本上認可「隱」的釋讀。可以說，文字釋讀是竹書《孔子詩論》取得成就最大的部分。

（二）留白簡的認定

《孔子詩論》的第2簡至第7簡上下兩端留白。根據相對完整的第2簡及下端完整的第6簡推斷，竹簡上端留白8.7釐米左右，下端留白8釐米左右。馬承源在整理時認為這部分簡制特殊，應放在一起，和其他簡區別開編聯。上博楚竹書出版後，關於留白簡的形制及意義區分成為大家討論的一個熱點。留白是否反映了簡制的差異，留白處原本是否寫有文字等問題，學者對此有較大分歧。

一種意見認為「留白簡」與「滿寫簡」反映出簡制的差別，留白處原本也沒有文字，編聯時應該單獨考慮，此意見以廖名春、曹峰、李銳等為代表。¹⁶馬承源雖然認為這種留白十分特別，和滿寫簡應該分開，但在實際的編排中並沒有把二者分開，因為他將屬於滿寫簡的第1簡排在第2至第7簡前面，從而造成了事實上的混同。彭浩也認為留白簡抄寫方式不同於《孔子詩論》的滿寫簡，應單獨編聯，但他同時又認為留白部分原有文字，

後因某種緣故而刮去。¹⁷

另一種意見認為不存在滿寫簡和留白簡之別，李學勤、周鳳五、姜廣輝等持此種看法。但何以造成留白，則又有分歧。李學勤認為留白是「文字減脫，以致簡面皺縮」而形成，¹⁸周鳳五認為留白「可能是先寫後削，是削除文字所造成的」，¹⁹姜廣輝認為乃是抄寫者「在抄寫時預留了一定的空白」。²⁰由於不認為有簡制的差異，故李、姜的排序都是將留白簡與滿寫簡混在一起編排。

留白簡的問題很重要，其直接關係到《孔子詩論》簡的編聯。目前簡序編聯差異頗大，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對留白簡的認定存在巨大差異。但由於此前並不見這種出土文獻類型，傳世文獻又缺載，研究起來難度很大。

（三）簡序編聯

目前為止，似乎《孔子詩論》的編聯還沒有一個定說，雖然未見關於《孔子詩論》編聯的專文，但研究《孔子詩論》專著或碩、博論文仍在討論這一問題。就筆者所見，除整理者馬承源的排序外，對《孔子詩論》簡序進行編聯的還有李學勤〈《詩論》簡的編聯與復原〉、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形制與編聯〉、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曹峰〈對孔子詩論第八簡以後簡序的再調整——從語言特色的角度入手〉、李守奎〈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邦風》訂補〉、²¹范毓周〈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詩論》的釋文、簡序與分章〉、濮茅左〈《孔子詩論》簡序補析〉、李銳

15 李開，〈滬博楚竹簡《孔子詩論》「𠂔」考釋〉，《古漢語研究》2004: 11: 104-105；李學勤，〈釋《詩論》中的「兔」及從「兔」之字〉，《北方論叢》2003: 1: 55-56。

16 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形制與編聯〉，《孔子研究》2002: 3: 10-16；曹峰，〈對《孔子詩論》第八簡以後簡序的再調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99-209；李銳，〈《孔子詩論》簡序調整芻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92-198。

17 彭浩，〈《詩論》留白簡與古書抄寫格式〉，廖名春編，《新出簡帛與儒家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2002），頁120-122。

18 李學勤，〈《詩論》簡的編聯與復原〉，《中國哲學史》2002: 5: 5-8。

19 周鳳五，〈論上博《孔子詩論》竹簡留白問題〉，《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87-191。

20 姜廣輝，〈關於古《詩序》的編聯、釋讀與定位諸問題研究〉，《中國哲學》24: 143-181。

21 李守奎，〈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邦風》訂補〉，《古籍整理與研究學刊》2002: 3: 7-10。

〈孔子詩論簡序調整芻議〉、曹建國〈論上博《孔子詩論》簡的編聯〉、²² 季旭昇〈《孔子詩論》分章編聯補缺〉、²³ 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²⁴ 馮時〈戰國楚竹書《子羔·孔子詩論》研究〉²⁵等。此外，周鳳五、胡平生、楊春梅、張三夕等對簡序編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²⁶

造成簡序編聯差異的原因首先是編聯原則的設定，即優先考慮的到底是形制還是簡文；其次便是對留白簡的認定；再次則是對第6簡的處理。

與簡序編聯相關的一個問題便是《孔子詩論》的分章。同樣一部竹書，多的可以分13章之多，少的則分為2章，差異同樣很大。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便是對竹書性質的認定，即竹書《孔子詩論》到底是不是一部具有鮮明主旨且內在邏輯線索明晰的論文，如李學勤、范毓周等認為《孔子詩論》是一篇有鮮明主旨且邏輯明晰的論文，而張三夕則認為「現存的《詩論》簡因為殘斷太多，其間看不出內在的嚴格的邏輯關係」。²⁷

（四）詩篇考釋

1. 篇名考釋：《孔子詩論》到底涉及多少詩篇，大家意見不一。馬承源在《詩論·附一》中開列了《孔子詩論》所涉及詩篇，共60首，他將〈采葛〉與〈葛覃〉

誤為一篇，如果加上這一篇，實際上共有61篇。何琳儀將第16簡「夫葛之見歌也」的「夫葛」讀為《詩·山有扶蘇》，第20簡「或前之而後交，人不可觸也」斷為「或前之而後，交人不可觸也」，讀「交人」為《詩·陳風·月出》。²⁸ 馮勝君將第27簡「子立」釋作《詩·鄭風·子衿》，²⁹ 俞志慧將第27簡「賓贈」釋作不見於《詩經》的詩篇。³⁰ 與此同時，又有學者將馬承源釋作詩篇名的第27簡「可斯」、第29簡「卷而」、「俚而」等不作為詩篇名，如李學勤。³¹

2. 詩篇的認定：連同誤將〈采葛〉與〈葛覃〉混為一篇而少算的一篇，馬承源認為實際上有8篇不見於今本《詩經》，屬逸詩。經過學者的努力，有的詩篇已經釋出，並達成了共識，如〈葛覃〉、〈采葛〉、〈牆有茨〉。有的仍有爭論，如〈中氏〉，李零、何琳儀釋作〈螽斯〉，³² 李學勤、楊澤生則認為今本《詩經·燕燕》的最後一章為錯簡，應屬於另一首詩，即《孔子詩論》所論之〈中氏〉。³³ 此外〈俚而〉、〈可斯〉、〈角幡〉、〈河水〉等均有爭論。另外〈黃鳥〉、〈杕杜〉、〈揚之水〉等幾首詩在今本《詩經》中均有幾首同名異類的詩篇，究竟屬於哪一篇，意見不一，如〈黃鳥〉，一般為屬於〈小雅〉，但李零、劉信芳卻認為是〈秦風·黃鳥〉。³⁴

3. 逸詩的認定：這些有爭議的詩篇中是否有逸詩，

22 曹建國，〈論上博《孔子詩論》簡的編聯〉，簡帛研究網站，2003.4.11。

23 鄭玉珊，「上博（一）·孔子詩論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5），頁9。

24 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8-22。

25 馮時，〈戰國楚竹書《子羔·孔子詩論》研究〉，《考古學報》2004: 11: 377-418。

26 周鳳五，〈論上博《孔子詩論》竹簡留白問題〉；胡平生，〈做好《詩論》的編聯和考釋〉，《文藝研究》2002: 2: 48-50；楊春梅，〈關於《詩論》簡的編聯及相關問題研究綜述〉，《文史哲》2004: 1: 163-167；張三夕，〈關於上博簡《孔子詩論》編聯排序的幾個問題〉，《華中師範大學學報》41: 5（2002.9）: 61-67。

27 張三夕，〈關於上博簡《孔子詩論》編聯排序的幾個問題〉。

28 何琳儀，〈滬簡《詩論》選釋〉。

29 馮勝君，〈讀上博簡《孔子詩論》劄記〉，《古籍整理與研究學刊》2002: 3: 11-13。

30 俞志慧，〈《孔子詩論》五題〉，《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07-326。

31 李學勤在〈《詩論》與《詩》〉（《中國哲學》24: 121-136）及〈《詩論》簡的編聯與復原〉兩文中均對《詩論》作了分章及釋文，釋文中均不以這幾處文字為詩篇名。

32 李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文校訂〉；何琳儀，〈滬簡《詩論》選釋〉。

33 李學勤，〈《詩論》與《詩》〉；楊澤生，〈試說《孔子詩論》中的篇名〈中氏〉〉，《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355-362。

34 劉信芳，〈楚簡《詩論》試解五題〉，「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研討會論文（上海：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2002.7.28-30）。

目前也意見不一。如〈河水〉，《國語》〈晉語四〉及《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均提到這首詩，韋昭以為是《詩·沔水》之誤，杜預則認為是逸詩，但又強作解人。所以當《孔子詩論》出現〈河水〉時，便歧義紛紛，周鳳五、何琳儀以為是《詩·新臺》，³⁵ 廖名春以為是《詩·伐檀》，³⁶ 俞志慧仍主韋昭說，³⁷ 王志平認為是〈新臺〉、〈伐檀〉、〈碩人〉中的一首，但「究為何首，不得而知」，³⁸ 李學勤則認為是逸詩。³⁹

篇名的釋讀及逸詩的認定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它關係到《孔子詩論》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尤其是「孔子刪《詩》」及「孔門《詩》傳」等一系列先秦詩學問題。

（五）《孔子詩論》的作者

在《孔子詩論》公布伊始，關於《孔子詩論》的作者成為大家討論的一個焦點問題，僅2002年，見諸各學術刊物討論《孔子詩論》作者的文章就有8篇，⁴⁰ 分別提出了子夏說、子羔說、孔門弟子說、非孔門傳說，連同整理者馬承源的孔子說，共有5種說法。後來又有討論《孔子詩論》的文章發表，基本上為上述諸說的補充，或上述諸說的綜述，未能再另創新說。此外，筆者一直認為《孔子詩論》與子游學派存在密切的學術關

聯，⁴¹ 說詳另文。

與作者問題關係密切的是這部竹書的命名。認為竹書作者是孔子的主張命名為《孔子詩論》，如馬承源、王齊洲等。⁴² 而認為竹書並非完全為孔子《詩》說的李學勤、彭林等主張將之命名為《詩論》。江林昌先是稱之為《詩論》，後來又主張命名為《詩說》，⁴³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朱淵清。⁴⁴ 而姜廣輝則極力主張將《孔子詩論》命名為《古詩序》，以區別於〈毛詩序〉，持相似觀點還有饒宗頤，其文章中稱竹書為〈詩序〉。⁴⁵

以上所述均屬於整理性的研究，透過上文綜述我們不難看出，關於《孔子詩論》這部先秦佚籍，學界還存在巨大的分歧，如果要取得一致，則仍有許多工作要做，或是需要大量的材料。同樣，關於《孔子詩論》的價值性判斷，學術界也有諸多的分歧。不言而喻，大家都一致肯定《孔子詩論》的學術價值，尤其是它對《詩經》學、中國文學研究的價值。上世紀20年代，王國維就倡言出土文獻的重要價值，認為古來新學問大多源自新發現，並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應該說王氏這一學術理念影響深遠且得到了很好的貫徹，任何一門學科都不曾忽視出土文獻之於本學科的重要價值，文學也不能例外。例如，1999年召開的「出土文獻與中國

35 周鳳五，〈《孔子詩論》簡新釋文及注釋〉；何琳儀，〈滬簡《詩論》選釋〉。

36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

37 俞志慧，〈《孔子詩論》五題〉。

38 王志平，〈《詩論》校箋〉。

39 李學勤，〈《詩論》與《詩》〉。

40 李學勤，〈《詩論》體裁與作者〉，《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51-61；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作者與作年——兼論子羔也可能傳《詩》〉，《齊魯學刊》2002: 3: 94-99；彭林，〈關於《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的篇名與作者〉，《孔子研究》2002: 3: 7-9；鄭傑文，〈上博藏戰國楚竹書《詩論》作者試測〉，《文學遺產》2002: 7: 4-13；晁福林，〈從王權觀念變化看上博簡《詩論》的作者及時代〉，《中國社會科學》2002: 11: 190-200；陳立，〈《孔子詩論》的作者與時代〉，《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62-73；高華平，〈上博簡《孔子詩論》的論詩特色及其作者問題〉，《華中師範大學學報》41: 5（2002.9）: 55-60、87；江林昌，〈上博竹簡《詩論》的作者及其與今傳本〈毛詩序〉的關係〉，《文學遺產》2002: 3: 4-15。

41 曹建國，「出土文獻與先秦《詩》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4），頁204-240。

42 王齊洲，〈孔子、子夏詩論比較——兼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之命名〉，《華中師範大學學報》41: 5（2002.9）: 48-54。

43 江林昌，〈由上博簡〈詩說〉的體例論其定名與作者〉，《孔子研究》2004: 7: 4-13。

44 朱淵清在〈從孔子論〈甘棠〉看孔門《詩》傳〉中認為《孔子詩論》宜命名為「孔子《詩》說」，《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137。

45 饒宗頤，〈竹書《詩序》小箋〉，《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頁228-232。

文學學術研討會」，就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藝術的關係、影響、學術方略、研究方法、發展戰略等問題進行了討論。⁴⁶由於許多出土文獻關涉到《詩經》，所以也有許多學者著文專題討論出土文獻與《詩經》研究之關係，如楊朝明〈出土文獻與《詩經》研究〉、夏傳才〈《詩經》出土文獻和古籍整理〉等。⁴⁷所以《孔子詩論》一公布，便立刻引起了轟動，學者對其學術價值，尤其是文學研究價值和經學研究價值予以很高的評價。

（六）《孔子詩論》與〈詩序〉的關係

《孔子詩論》與〈詩序〉的關係，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孔子詩論》是不是〈詩序〉性質的東西。二、《孔子詩論》與〈毛詩序〉具有何種關係。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首先弄清楚何謂「序」，何謂「論」。《尚書正義》卷1「尚書序」下，〈經典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並敘為注之由。」孔穎達曰：「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訖存亡，注說之由。」⁴⁸由此可見，古人所謂「序」主要內容應該是解釋作品撰作的歷史背景，以及敘述作注之由，基本上屬於文外。而「論」作為一種文體，即議論文。劉勰《文心雕龍·論說》曰：「述經敘理曰論」，「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可見「論」在解釋經典時與傳、注相參，是對經典文本理解，完全是屬於文內。既然有內、外之別，二者理宜不相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承源將竹書命名為「論」是合適的。但馬承源在這個問題

上的態度事實上是模稜兩可的。他既然將這部竹書命名為《孔子詩論》，就表明這部竹書是孔子對《詩》的理解。且在整理附記〈孔評詩義與毛詩小序評語對照表〉中，將其釋出的詩篇與〈毛詩〉小序一一作了對照，並在〈篇後記〉中提出了他的結論，「《孔子詩論》沒有發現如《毛詩》小序所言的那樣許多的『美刺』」，因此可能小序的「美刺」有「相當部分是漢儒的臆測」。似乎從總的傾向上，馬氏不贊成將《孔子詩論》與〈毛詩序〉等同起來。但在整理說明中又論及前7支簡是「屬於《詩》序言的性質」。⁴⁹

馬承源游移的態度似乎預示了學界關於這一問題的分歧和即將出現的激烈爭論。果不出其然，《孔子詩論》一經發布，關於《孔子詩論》與〈毛詩序〉有何種關係，便成了討論熱點。綜合起來說，這種爭執無非是兩點：一是認為《孔子詩論》與〈毛詩序〉相同或相似，屬於同一《詩》學系統，如王小盾、馬銀琴、方銘等。⁵⁰而江林昌更是力證《孔子詩論》與〈毛詩序〉同，並認為《孔子詩論》便是失傳的子夏〈詩序〉。⁵¹在〈由古文經學的淵源再論《詩論》與〈毛詩序〉的關係〉⁵²一文中，其以子夏、李克、吳起以至〈毛詩序〉的流傳情況為線，通過對比《孔子詩論》、中山王墓銅器、〈毛詩序〉，力圖證明《孔子詩論》與〈毛詩序〉的源流關係。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孔子詩論》與〈毛詩序〉不是一個系統的東西，兩者在言《詩》方式上有著明顯的差異，如王齊洲、曹建國、李會玲、王洲明等。⁵³同樣是比較，

46 會議由《文藝研究》編輯部與首都師大中文系等單位於1999年12月在北京召開，論文刊載在《文藝研究》2000: 3。

47 楊朝明，〈出土文獻與《詩經》研究〉，《詩經研究叢刊》第2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頁256-264；夏傳才，〈《詩經》出土文獻和古籍整理〉，《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8: 1（2005.1）：66-75。

48 孔穎達，《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1，頁113。

49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122。

50 王小盾、馬銀琴，〈從《詩論》與〈詩序〉的關係看《詩論》的性質與功能〉，《文藝研究》2002: 2: 45-48；方銘，〈《孔子詩論》與孔子文學目的的再認識〉，《文藝研究》2002: 2: 33-35。

51 江林昌，〈楚簡《詩論》與早期經學史的有關問題〉，《中國哲學》24: 208-221；江林昌，〈上博竹簡《詩論》的作者及其與今傳本〈毛詩序〉的關係〉。

52 江林昌，〈由古文經學的淵源再論《詩論》與〈毛詩序〉的關係〉，《齊魯學刊》2002: 3: 100-108。

53 王齊洲，〈孔子、子夏詩論比較——兼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之命名〉，《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2: 5；曹建國，〈論上博簡《孔子詩論》與〈毛詩序〉的闡釋差異〉，《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 3（2003.5）：89-92；李會玲，〈《孔子詩論》與〈毛詩序〉說詩方式之比較〉，《武漢大學學報》56: 5（2003.9）；王洲明，〈上博《詩論》的論詩特點與〈毛序〉的作期〉，《山東大學學報》2004: 9: 30-35。

王廷治在〈《詩論》與〈毛詩序〉的比較研究〉⁵⁴一文中，得出「《詩論》論詩多切合實際，而〈毛詩序〉論詩多激進、臆測、穿鑿、附會之說」的結論，這確實頗耐人尋味。看來出發點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大相逕庭。同樣，李學勤在〈《詩論》說〈關雎〉等7篇釋義〉⁵⁵中，通過對《孔子詩論》說〈關雎〉等7篇與〈毛詩序〉、《毛傳》說〈關雎〉等7篇比較，得出「《孔子詩論》和〈詩序〉、《毛傳》在思想觀點上雖有承襲，實際距離是相當大的，即以〈關雎〉等7篇而論，差別即很明顯」。姜廣輝也認為《孔子詩論》與〈毛詩序〉差別較大。⁵⁶

大家對《孔子詩論》與〈毛詩序〉關係的認定差異，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對於〈毛詩序〉存在的歷史理據認定差異決定的。相信《孔子詩論》與〈毛詩序〉相同或相似的學者認為〈毛詩序〉一定是古來有之，如王小盾、馬銀琴就認為〈詩序〉是周代禮樂制度的產物，淵源久遠。而不認同《孔子詩論》與〈毛詩序〉屬於同一系統的學者，多認為〈毛詩序〉是戰國晚近乃至漢代的產物。另外，有的學者力證《孔子詩論》與〈毛詩序〉相同，目的是為了證明《詩論》的作者是子夏，如江林昌。當然，不論《孔子詩論》是否與〈詩序〉屬於同一系統，它至少證明了在〈毛詩序〉之前儒家久遠的說詩傳統。漢儒詩說並非空穴來風，至少是有所借鑒。

孔子與《詩》 自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提出孔子刪詩以來，歷來頗多爭論，有刪詩、不刪詩、整理《詩》等多種說法，且各有證據。《孔子詩論》的發現，尤其是其中逸詩的存在，似乎為「孔子刪詩」這一《詩經》學史公案的解決提供了契機。學者紛紛著文，討論孔子刪詩的問題。但結論仍是尖銳對立的狀況，或以

《孔子詩論》為據，證明孔子不刪詩，如施宣國。⁵⁷也有學者以《孔子詩論》為據，證明孔子確實刪詩，如楊朝明、劉生良。⁵⁸也有人主張超越這個問題，如楊春梅。⁵⁹

其實孔子刪詩這個古來聚訟紛紜的問題，要解決理應從源頭清算。司馬遷說孔子刪詩，其意在於今本《詩經》（前提是我們必須承認漢代四家詩的《詩》本沒有差異）為孔子刪定。而今天我們所爭論的問題，孔子到底有沒有刪過詩，這兩者從本質上說並非是一回事。孔子是否刪過詩，單靠目前掌握材料，包括出土文獻在內，似乎都還解決不了。但《論語》中孔子論詩有逸詩的存在，上博竹書《孔子詩論》也有逸詩的存在。這說明孔子使用的《詩》文本與今傳本有不同，再加上《詩經》編次等佐證，說孔子使用的《詩》本與今本《詩經》有別應該沒有多大的問題。換句話說，孔子是否刪詩，我們雖不能確定，但可以斷言今傳本《詩經》並非孔子刪定。

（七）《詩經》的編次

所謂《詩經》的編次是指《詩經》類序的順序。整理者馬承源認為《孔子詩論》所反映的編排次序非如今天的〈風〉、〈雅〉、〈頌〉，而是〈頌〉、〈大雅〉、〈小雅〉、〈邦風〉，並且以此為序編排了簡序。對此，大家多不同意，認為先秦《詩》的類序仍然是〈風〉、〈雅〉、〈頌〉的順序，如邢文、呂紹綱等。⁶⁰

就現有的材料而言，可以推斷先秦《詩》的類序應該是〈風〉、〈雅〉、〈頌〉。這不僅因為《孔子詩論》討論《詩》主要還是按照這一順序，就傳世文獻而言也是如此。在傳世文獻中最具文本意義的當是季札觀樂，其

54 王廷治，〈《詩論》與〈毛詩序〉的比較研究〉，「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研討會論文。

55 李學勤，〈《詩論》說〈關雎〉等7篇釋義〉，《齊魯學刊》2002: 3: 90-93。

56 姜廣輝，〈關於《古詩序》的編聯、釋讀與定位諸問題研究〉，《中國哲學》24。

57 施宣國，〈孔子有沒有刪過詩〉，《文匯報》2000.8.26。

58 楊朝明，〈上海博物館竹書《詩論》與孔子刪詩問題〉，《孔子研究》2001: 1: 109-111；劉生良，〈孔子刪詩說考辨及其新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32: 3（2003.5）: 92-98。

59 楊春梅，〈上博竹書《詩論》與《詩經》學的幾個問題〉，《齊魯學刊》2002: 7: 22-28。

60 邢文，〈風、雅、頌與先秦詩學〉，《中國哲學》24: 197-207。呂紹綱，蔡先金，〈楚竹書《孔子詩論》「類序」辨析〉，《孔子研究》2004: 3: 14-21。

所反映的《詩》本編排與今本並無太大的差別。或許正如姜廣輝所言，討論者在言及詩、樂的順序時，有根據當下情境臨時作出調整的可能。⁶¹ 或者說，討論者之所以在討論聲樂時以〈頌〉、〈雅〉、〈風〉為序，與〈頌〉樂、〈雅〉樂、〈風〉樂地位尊卑有關。

此外李銳的〈四始新證〉，依據馬王堆帛書、郭店竹簡、《孔子詩論》等討論了「四始」的意義，說明〈關雎〉、〈鹿鳴〉、〈清廟〉、〈文王〉等四首詩討論的正是作為禮義之根本的夫婦、君臣、父子、天人之關係，而這些與孔子有著密切的關係。從而證明「四始」帶有鮮明的孔子及其後學的思想色彩，正是孔子及其後學賦予了四始以思想史的意義。⁶² 但我覺得這一問題尚有討論之必要，單憑現有的資料似乎不能證明孔子與「四始」之間的關係，至少不能完全解釋漢代《詩》家說「四始」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如果說「四始」不是漢人新說，似乎不能解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

（八）對《詩》的重新闡釋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漢代今文三家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今天我們已不能見到漢代今文詩說，清人的輯佚雖用力頗勤，也只能是一鱗半爪。而今傳的《毛傳》「自謂子夏所傳」，三國人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及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引三國徐整說，均對《毛詩》的承傳作了交代。但《詩》經秦火，其勢難全，自是不

爭的事實，〈毛序〉及《毛傳》即便是對先秦《詩》學有所承傳，也不可能與之保持完全的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學界希望借助新出土《詩》文獻以突破漢代《詩》學的圍域，與先秦《詩》學直接對話，並探詢《詩》學闡釋的演變狀況。

故而《孔子詩論》一經公布，便有學者開始做這種嘗試。或從文字入手，考證詩篇原初意義，如劉信芳〈楚簡《詩論》苑丘考〉考證《詩論》之「備丘」乃「陳東門之外社稷之類、宗教設施之所在。其地有丘，有如雲夢之台。又粉楸之林，則如宋之桑林，可供男女幽會。其地有如禁苑，乃貴族祀神兼會神女之處所，非下等人所能出入」。而《毛詩》之「苑丘」乃「苑中之丘」，非所謂「四周高，中央下」之苑丘。⁶³ 或從《詩論》評論詩的內容入手，探詢詩的古義。如于蒞〈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詩論與《詩經》古義〉，結合《詩論》論詩，對〈關雎〉、〈葛覃〉、〈卷耳〉等7首詩意義作了新的闡釋，重點比較了《詩論》論詩與〈毛詩序〉的差異。⁶⁴ 或從史、詩互證入手，結合《詩論》論詩，探求深藏詩篇背後的史事、史跡。關於這一點，晁福林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如其〈《上博簡·孔子詩論》「樛木之時」釋義〉，通過對春秋戰國時期廣泛流行的「時」的觀念的考察，將「福履」讀為「蔑（伐）曆」，認為「〈樛木〉的主旨在於『時』，其意思是強調貴族（君子）獲取權位尚需依靠上層的考察與首肯，通過『蔑曆（福履）』而使地位上升」。⁶⁵ 或從闡釋學史的角度，比

61 姜廣輝，〈《關於《古詩序》的編聯、釋讀與定位諸問題的研究〉，《中國哲學》24。

62 李銳，〈四始新證〉，《孔子研究》2004: 3: 39-45。

63 劉信芳，〈楚簡《詩論》苑丘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 5: 4-7、22。

64 于蒞，〈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詩論與《詩經》古義〉，《學習與探索》2005: 3: 149-152。

65 晁福林，〈《上博簡·孔子詩論》「樛木之時」釋義〉，《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 5: 1-4。此外，截至2005年5月，晁氏發表的相關論文有：〈上博簡《詩論》「〈小旻〉多疑」釋義〉，《鄭州大學學報》35: 5（2002.9）: 55-58；〈上博簡《詩論》與《詩經·黃鳥》探論〉，《江海學刊》2002: 9: 136-142；〈上博簡《詩論》「以人益」與〈詩·菁菁者莪〉考論〉，《齊魯學刊》2002: 11: 92-96；〈上博簡《詩論》與〈詩·杕杜〉探析——兼論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結構的鬆動及其影響〉，《學術月刊》2003: 1: 38-44；〈上博簡〈甘棠〉之論與召公奭史事探析——附論〈尚書·召誥〉的性質〉，《南都學壇》23: 5（2003.1）: 19-25；〈上博簡《詩論》「穀風悲」釋義——並論先秦儒家婚姻觀念的若干問題〉，《中華文化論壇》2003: 3: 19-24；〈上博簡《詩論》「漢廣之智」與〈詩·漢廣〉篇探論：兼論儒家情愛觀的若干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 3: 1-7；〈上博簡《孔子詩論》「仲氏」與〈詩·仲氏〉篇探論——兼論「共和執政」的若干問題〉，《孔子研究》2003: 5: 16-23；〈《詩》、史互證：上博簡《詩論》鉤沉〉，《史學月刊》2003: 5: 19-25；〈〈詩·燕燕〉與儒家「慎獨」思想考析〉，《浙江學刊》

較竹書《孔子詩論》與漢代《詩》學闡釋來探討先秦兩漢詩學闡釋的差異。比如尚學鋒〈從〈關雎〉的闡釋史看先秦兩漢詩學〉，認為先秦詩學闡釋本著因情制禮的主題，運用譬喻、聯想感悟的闡釋方式，體現內在獨立自由的人文精神，是對西周王官之學的突破。而漢代詩學闡釋為了適應現實的需要，將《詩論》所揭示的先秦古義一步步引申，工具化、歷史化的闡釋傾向日益突出。認為從學術的角度，漢代的詩學闡釋多穿鑿、附會之處，禁不起推敲。⁶⁶

但這裏有些問題需要提出來以引起注意：首先是本義、原初意義、古義等概念的區分，如果從純粹的闡釋學層面使用這些術語，就一定要十分小心。其次是褒貶取舍，從闡釋角度說，竹書《孔子詩論》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闡釋意義，一種可以與漢代詩學相參比的資源，而不是一種價值判斷的依據。我們並不能因《詩論》而否定漢代詩學闡釋的價值。最後，關於史、詩互證的問題一定要從本文中來，而不是索隱。尤其不能為了牽合某些史事而曲解《詩論》簡文，否則就難免穿鑿。我這樣說不是要否定諸位先生的努力，因為作為一種新材料，竹書《孔子詩論》確實會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視角，也將極大地豐富我們對《詩經》的認識和理解。

（九）《孔子詩論》的思想淵源

目前學界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以細化為文內視角和文外視角兩種。所謂文內視角即從竹書本身所體現出來的思想入手，探討它的思想特色及其思想史價值，如廖名春分別從禮和天命論、誠論等方面討論了《孔子詩論》的哲學品格，⁶⁷而李開則討論了《孔子詩論》的人文精神。⁶⁸當然更多的討論是從外部視域展開，即從大的學術背景討論《孔子詩論》和其他先秦典籍的學術關聯。許多學者認為《孔子詩論》和孔子論《詩》以及孔子的詩教主張有著密切的學術關聯，如曹建國、馬銀琴等。⁶⁹陳桐生著文討論了《孔子詩論》與《論語》以及近出楚簡〈性自命出〉的關係，⁷⁰傅道彬、張明華、姚小鷗等分別討論了《孔子詩論》和春秋賦詩、春秋詩學、《易傳》之間的關係。⁷¹所有這些都能給人以啟發，對於我們討論《孔子詩論》作者等問題也有一定的幫助。

陳桐生在其新著《孔子詩論研究》一書中，提出《孔子詩論》屬於南楚《詩》學，有別於以孟子《詩》學為代表的北方《詩》學。北方《詩》學主張以史說《詩》，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而南方《詩》學重視樂教，受到性情論和禮義學說的影響，說詩重視本文，並能概括〈風〉、〈小雅〉、〈大雅〉、〈頌〉四類詩的大旨，表現出「發

2004: 2: 121-127; 〈試談〈詩·小宛〉主旨及上博簡《詩論》第8號簡的釋讀——附論周代「為人後」的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 5: 3-14; 〈上博簡《詩論》與《詩·鄭風·將仲子》的幾個問題〉，《南都學壇》24: 6 (2004.11): 64-69; 〈從上博簡《詩論》第19簡看〈詩·黍離〉的「溺志」〉，《中州學刊》2005: 1: 143-146; 〈談上博簡《詩論》第17簡與《詩·揚之水》篇的幾個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34: 3 (2005.5): 55-59; 〈從上博簡《詩論》第21簡看孔子的情愛觀〉，《文史哲》2005: 3: 26-33; 〈從上博簡《詩論》對於〈木瓜〉篇的評析看《詩經》編纂問題〉，《史學史研究》2005: 1: 1-8。

66 尚學鋒，〈從〈關雎〉的闡釋史看先秦兩漢詩學〉，《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4: 7: 38-43。

67 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天命論與「誠」論〉，《哲學研究》2002: 9: 51-56。廖名春，〈上博《詩論》簡「以禮說詩」初探〉，《中國詩歌研究》第2期（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42-150。

68 李開，〈論上博簡《孔子詩論》的人文精神〉，《江蘇社會科學》2005: 3: 12-16。

69 曹建國，〈孔子論詩與上博簡《孔子詩論》之比較〉，《孔子研究》2003: 5: 30-36；馬銀琴，〈論孔子的詩教主張及其思想淵源〉，《文學評論》2004: 9: 71-80。

70 陳桐生，〈《論語》與《孔子詩論》的學術聯繫與區別〉，《孔子研究》2004: 3: 22-29、13；陳桐生，〈哲學·禮學·詩學——談〈性情論〉與《孔子詩論》的學術聯繫〉，《中國哲學史》2004: 10: 77-84。

71 傅道彬，〈《孔子詩論》與春秋時代的用詩風氣〉，《文藝研究》2002: 2: 39-42；姚小鷗，〈《周易》經傳與《孔子詩論》的哲學品格〉，《文學評論》2003: 9: 47-53；張明華，〈《孔子詩論》與春秋時期詩學觀念之比較〉，《孔子研究》2004: 2: 30-38、21。

乎情，止乎禮義」的理論傾向。⁷²

《孔子詩論》的詩學史意義，首先看《孔子詩論》在先秦詩學史上的意義。姚小鷗〈《孔子詩論》與先秦詩學〉認為，《孔子詩論》「反映了中國先秦詩學繁榮與發達的程度，給了一個使人們在哲學層面重新認識先秦詩學的切入口，並預示著當代先秦詩學研究在整個學科領域的學術進展中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並且《孔子詩論》包含有多種先秦詩學著作和豐富的學術內容，在理論上也達到了高度成熟程度，具有堅實的哲學基礎和成熟的批評模式。而且通過與傳世文獻的勘比對照，可以使我們對傳世文獻的價值獲得新的認識。⁷³方銘的〈《孔子詩論》與孔子文學目的論的再認識〉，認為孔子對文學創作目的的終極論述是文學要體現對人的關懷。⁷⁴而張玖青、曹建國〈上博《詩論》簡與孔子詩學思想的新闡釋〉，則認為《孔子詩論》豐富我們對孔子文學思想的體認，尤其是關於「情」的文學思想。⁷⁵程亞林、黃鳴〈楚竹書《詩論》在先秦詩論史上的地位〉，認為先秦存在三大詩學系統：實用主義、政教性文學文本主義、文學文本主義，《孔子詩論》屬於文學文本主義，即把《詩經》當作文學文本，並從文學的角度闡釋它。⁷⁶

其次是它在整個中國詩學上的意義。《孔子詩論》說「樂亡隱情」，其下品評詩歌也多從情、志入手，這說明情、志是《孔子詩論》重要的範疇。這一點引起了學者的高度關注，因為它有可能改變傳統文學批評中從言志到言情的觀念。廖群〈「樂亡離情」：《孔子詩論》的「歌言情」說〉認為孔子評論詩歌首先看重的是「情」，不反對有情；中國古代文論從「言志」到「言情」的單線就將變成「言志」與「言情」的交叉，只不過各個時代有所側重而已。⁷⁷

四、〈采風曲目〉

目前學術界對於〈采風曲目〉的研究尚未真正開始，基本上還是限於文字考釋工作，比如董珊、何有祖等人的考釋文章。⁷⁸

我認為研究〈采風曲目〉需要注意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音樂史家的積極參與，因為這篇佚籍涉及到先秦時楚地的音階名。二是考釋〈采風曲目〉的音階名要和曾侯乙墓出土編鐘的音階名聯繫起來，二者之間有許多可對應之處。三是考釋〈采風曲目〉的樂曲名不必牽連《詩經》篇名，儘管其中有〈碩人〉可以和《詩經》中同題詩篇相聯繫，但並不能證明〈采風曲目〉中的〈碩人〉就一定是《詩經》中的〈碩人〉篇，因為即便是《詩經》本身也有許多同題的詩篇。〈采風曲目〉屬於楚地音樂，與中原文化圈的《詩經》理應存在一定的差距。與此同時，也就牽涉到這篇簡帛佚籍的命名。我認為，不宜命名為〈采風曲目〉，這樣很容易讓人想到《詩經》學上的「采風」問題，這樣的命名實際上是將這篇簡帛佚籍納入了《詩經》系統，而容易導致夾纏。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認為〈采風曲目〉宜命名為〈楚曲目〉

〈楚曲目〉對研究先秦《詩經》，尤其是《詩經》學史某些問題的探討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比如《詩經》入樂的問題，兩者雖不屬於一個系統的東西，但屬於同一性質的，〈楚曲目〉可以直接證明《詩經》是入樂的，以及先秦《詩》樂可能的演奏形式，傳統「三詩一終」的觀念也許要重新思考。再如「四始」，其或許不是《詩》之編目，而是曲之編目。〈楚曲目〉把曲目編為宮、商、徵、羽四類，這或許是《詩》分為四，並最終產生「四始」的本初音樂學緣起。儘管楚人律學體系與周代雅樂體制有別，其「四基音」的特徵則是一致的。此外「正

72 陳桐生，《孔子詩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73 姚小鷗，〈《孔子詩論》與先秦詩學〉，《文藝研究》2002: 2: 36-39。

74 方銘，〈《孔子詩論》與孔子文學目的論的再認識〉，《文藝研究》2002: 2: 33-36。

75 張玖青、曹建國，〈上博《詩論》簡與孔子詩學思想的新闡釋〉，《文學評論》2004: 9（青年學者專號）：42-49。

76 程亞林、黃鳴，〈楚竹書《詩論》在先秦詩論史上的地位〉，《武漢大學學報》55: 5（2002.9）：552-559。

77 廖群，〈「樂亡離情」：《孔子詩論》的「歌言情」說〉，《文藝研究》2002: 2: 50-52。

78 董珊，〈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簡帛研究網，2005.2.20；何有祖，〈上博竹書四割記〉，簡帛研究網，2005.4.15。

變」也與音樂有關，應是周代雅樂體制變遷的產物。

五、〈逸詩〉

上博簡（四）〈逸詩〉包括兩首逸詩，一曰〈交交鳴鵲〉，一曰〈多薪〉。學術界對於這兩首逸詩的研究也沒有太多的成果，主要是簡帛研究網站上發表的疏釋詞語的文章。相對來說，重點集中在對〈交交鳴鵲〉的討論上。季旭昇、廖名春、董珊、秦樺林等就簡文補字、釋字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⁷⁹ 廖名春在〈楚簡〈逸詩·多薪〉補釋〉中，提出〈多薪〉是一首楚人詩歌，這有一定的啟發意義。⁸⁰

同樣，新發現的楚人詩歌對我們研究先秦《詩》學，尤其是先秦《詩》的傳播與接受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通過這兩首逸詩，再結合青銅銘文、石鼓文等考古材料，我們可以探討先秦時期「雅詩」觀念的傳播深度與力度。

以上我們對近年與《詩》關係密切的出土文獻及其研究狀況作了大致梳理。諸位專家學者對《詩》學簡帛文獻予以高度的重視，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很大的成就，幾乎每一種相關出土文獻都有討論。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難發現其中巨大分歧的存在，尤其是上博

竹書《孔子詩論》。除了在文字考釋方面達成了某些共識之外，其他包括留白簡、簡序、作者、篇名、與〈毛詩序〉之間的關係等方面都還有不同的認識，有的甚至是對立的。這說明我們還有許多的工作要做，還有許多工作可以做。這需要我們沉潛心來，進行扎實的研究工作。誠如李學勤所言：「從歷史經驗看，對這樣內涵豐富的出土文獻，肯定要經過長時期的探究琢磨，才能有深入的體認理解。」⁸¹ 有些問題如果沒有新的出土文獻作參比，可能很難達成共識。其次我覺得學界尚沒有對近出的《詩》學簡帛文獻作綜合性研究，郭店簡〈緇衣〉、〈性自命出〉等篇基本上都是從心性角度論詩、解詩，上博簡《孔子詩論》最具特色的部分包括第 10-16、20、24 簡等也是從心性解讀詩篇的，難道這只是偶然的巧合？也許並沒有這麼簡單，我認為在孔子後學中或許存在一心性學詩派，把《詩》作為修身養性的工具，迥異於漢代詩學。也許正因為如此，進入漢代以後，這一詩學派便銷聲匿跡了。我們可以利用近出的簡帛文獻，努力探究這一詩學流派。誠如是，對於瞭解孔子之後的孔門《詩》傳，以及整個先秦時期《詩》學承傳的狀況都是大有裨益的。

79 廖名春，〈楚簡〈逸詩·交交鳴鵲〉補釋〉，簡帛研究網，2005.2.12；季旭昇，〈《上博四·逸詩·交交鳴鵲》補釋〉，簡帛研究網，2005.2.15；秦樺林，〈楚簡佚詩〈交交鳴鵲〉割記〉，簡帛研究網，2006.2.20；董珊，〈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簡帛研究網，2006.2.20。

80 廖名春，〈楚簡〈逸詩·多薪〉補釋〉，簡帛研究網，2005.2.12。

81 李學勤，〈《詩論》說〈關雎〉等7篇釋義〉。